

导 言

异质文化相碰撞，其结果是两者在冲突中最终走向融合，这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逻辑学输入中国后，在整个 20 世纪始终与中国文化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二者之间既有包容的一面，即逻辑学东渐后，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史学、教育、科学的变革，逻辑学本身也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于中国文化中；二者之间也有拒斥的一面，即逻辑学东渐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很好的发展。由此引发我们对 20 世纪逻辑学命运的文化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逻辑如何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中国人的思维的视野、中国人的文化思潮的，这使我们想起李约瑟曾经探讨过的问题。李约瑟说：“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1]“要问为什么近代科学和技术兴起于欧洲社会而不是在中国，也就等于问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兴起，为什么在那里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什么在那里没有 15 世纪到 18 世纪的伟大过渡时期的划时代的现象。”^[2]“倘若中国的环境条件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话，墨家或另一学派是否轮到自己也会创立独立的三段论式的静态逻辑，或者近代科学是否有可能从更加辩证的根基上或者是借助于某种全然不同的另一套体系而在亚洲发

展起来。”^[3]我们如何解开李约瑟之谜的？西方的形式分析思维的长足发展，而中国则自古以来，朴素的整体有机思维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其蕴涵的形式分析的思维长期受到冷遇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逻辑输入了中国，它作为西方工具理性和科学思维方式的代表，也同时输入了中国，但是由于它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相容性，以及西方逻辑的长足发展乃是以强大的工商和技术文明为基础的，因此西方逻辑在中国的命运一直在包容与排斥之两极之间徘徊，面对新世纪文明该如何使西方逻辑和与之相关的逻辑思维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思维重要内容，成为我们这个文化基本精神的内核。

在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中，逻辑东渐是以救亡为主旋律还是启蒙为主旋律呢？的确西方逻辑的输入，在相当程度上起到输入西学、科学启蒙、扫除迷信和恢复自尊的文化互动的作用。

在我们重建现代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得使我们的思维方法及形式、思维的准则及目标，自然也需要适合时代的要求、生活的要求、文化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化的要求，并加以创新，与如何以西方的逻辑和分析哲学将中国文化中的原理、思想和方法的义理加以清楚的呈现，而不失中国文化的内在的生命力，从它的内在的生命的理性来开拓中国文化的新活力，借助于西方逻辑思维的实现范畴性和思考上的系统性，来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使它能够以普遍的论证形式，以种种与中国文化相应的范畴系统及其意义架构来更完整、更清晰地、更系统的表达思想，克服我们固有

文化的缺陷，把它的真精神发挥出来，不仅适应中国现代文化对逻辑学的需要，而且还更能够以西方的分析哲学和逻辑来解析和整合所有的历史文化经验和思想历程。

西方逻辑是如何输入中国的，我们该如何反思中国古代逻辑究竟有没有逻辑呢？面对新世纪我们现代性的任务依然尚未完成，我们该如何解决和完成理性化、科学化和实证化（它使形式分析思维的基本特征，即它用共相、概念、一般和形式来把握经验和个别，也就是说逻辑所揭示的本质和原因使个体现象的本质和原因，也就是说借助于逻辑使我们的思维获得了实证性）和形态化（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逻辑乃是以公理化的、实现化的演绎的系统性为特征的，为近代西方产生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前提），将西方的那种重视科学在实践基础上的逻辑分析（逻辑在于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然而我们可以说以分析为核心的分析哲学可以说它就是广义上的逻辑。）把握整体、逻辑的严格论证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我们民族的普遍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呢？我们具体所理解的逻辑是否就是 20 世纪西方逻辑的正体呢？逻辑是否是中国人实现世界化、理性化（因为逻辑把理性形态化，而理性使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的关键，或者说逻辑化、科学化的、理性化、普遍化的、精确化和系统化的逻辑思维，逻辑何以进入中国文化的语境，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呢？而使中国文化获得普遍的理性的形式，实现用逻辑的理性的方法或分析方法更新中国文化的本质呢？似乎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逻辑与中国文化就一直处于排斥与包容的交错状态之中，在 21 世纪已经到来的新世纪里，我

们使西方逻辑与中国文化由排斥走向包容，又由包容、引进、输入走向交融、互动和中西逻辑融通的道路呢？

就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而言，“中国古代逻辑”以及“中国逻辑史”的提出，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西方逻辑学输入中国的结果。此前人们根本不晓得“逻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自1631年李之藻译出《名理探》，国人始知有“络日伽”（Logic）；1896年英国人艾约瑟译出《辨学启蒙》，人们才较系统地知道了西方逻辑学；1897年孙诒让受西方逻辑学及印度因明的启发，首先关注“中国逻辑”的探究，提出《墨经》“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4]此后，始有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的系统研究。1904年，梁启超著《墨子之论理学》问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墨家逻辑。1917年胡适完成了《先秦名学史》，从而有了第一部中国逻辑史专著。事实表明，没有西方逻辑的输入，就提不出“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而逻辑学在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是从严复1905年翻译的《穆勒名学）开始的。

上述文化背景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学术中所含逻辑思想的整理、阐释，还是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逻辑科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推动等，都离不开西方逻辑的影响。对此，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有过很好的说明：“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其观念皆颖异而刻入；与两千年来俗儒之理解迥殊别，而与今世西方学者所发

明，往往相印。……盖尝论之，《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5]梁氏所述表明，讨论“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的一个基本语境，是西方逻辑。所以，研究20世纪逻辑学的命运自然离不开研究西方逻辑学的输入及影响。

西方逻辑的影响只有通过中国学人方能实现。因之，西方逻辑对“中国古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乃至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与中国社会及学人认识、理解与接受西方逻辑的状况直接相关的。西方逻辑传入中国后的社会境况及种种遭遇，逻辑学东渐的命运及造成这种命运的文化原因，是我们分析和认识20世纪“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状况，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我们思考中国今日逻辑科学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借鉴。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试图对逻辑学东渐之命运和造成这种命运的文化原因给出回答。

建国后，逻辑学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50—60年代出现形式逻辑的讨论，虽然澄清了形式逻辑的一些问题，但是，其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十年文化大革命，逻辑学中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尽管逻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逻辑学并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70年代，逻辑学的发展出现停滞现象。建国后逻辑学的命运究竟怎样？逻辑学这种命运的原因何在？这与建国前逻辑学命运的文化原因有否相似之处？我们也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只有有了此种探讨，才能更好地把握逻辑学输入和发展的状况，总结20世纪中国逻辑史发展特点及规律，认识逻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这种探讨也是拓宽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深

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需要。

对逻辑学东渐命运的研究不仅是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需要，而且研究这种命运对于当前逻辑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从 17 世纪逻辑学开始进入中国至今已有几百年，然而，一方面国内逻辑学研究与西方逻辑学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实际一直在跟西方人走，迄今仍未建构起我们自己的逻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逻辑学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很好的作用。这在于，逻辑学不仅在西方是内在发生的；而且它在本质上也是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的集中性的代表。而在当今中国，理性精神依旧未完全确立起来，这意味着集中体现理性精神的逻辑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以前学界往往好从经济中寻找原因，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以理性精神才不可能在中国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当然承认是造成文化和文化的每一领域的现有发展状况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走向经济一元论。事实上，任一文化领域的发展不仅受经济状况所制约，而且受其它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的影响。换言之，每一学科的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文化环境，环境适宜，该学科才能生长起来。具体到逻辑学而言，当前国内逻辑学发展状况与其生长的整体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那么，逻辑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呢？显然着力于对 20 世纪西方逻辑东渐命运的演变及其文化因缘、文化原因的探析也许才能够为我们进一步将西方逻辑发展为有种内在的理性精神提供一些历史的明鉴和种种文化启示。

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一直试图建构一种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文化，建国后，许多学者也一直在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然而，时至今日，富有理性化、精确性新文化并未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西方文化并未真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或者说，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并未被国人所吸纳，而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逻辑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逻辑和逻辑思维方式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和显著特征的集中表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尤其是没有逻辑的思维，它就一刻也不能自立于世界的强大的民族之林。正因为如此，本书将以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为背景，以西学输入中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为切入点，通过系统地阐述西方逻辑进入中国的自身遭际，即与中国文化既冲撞又交融的历程——西方逻辑东渐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命运，来揭示逻辑学的传入在中西文化的汇通、交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思自 1840 年以来的诸多先贤们所提供的有关经验与教训，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汇这一现实而又是至关重要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逻辑学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从而阐明逻辑学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尤其是它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逻辑学命运的讨论本质上就是从逻辑学角度对西方文化在百年中国之命运的透视。此种透视自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对于中国文化的再生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逻辑学的发展。本选题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通过对西方逻辑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的考察，分析逻辑学在中国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并进而在“大逻辑观”的指导下，主张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应当走中西方逻辑的比较和融通

的道路。

有助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正由于逻辑以及整个西学的输入乃是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进程的关键，所以总结和考察西方逻辑（传统逻辑和现代数理逻辑）对近代和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推动与影响，将大大地有助于认识和弘扬逻辑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

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逻辑的应用价值和工具性意义。逻辑是正确思想的利器和工具。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文化的互动（如逻辑在哲学建构、语言研究、历史研究、素质教育、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和创新思维等领域的应用）之中，才能显示出来。本课题的重心就在于，它要立足于逻辑在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应用研究，来为当代的中国人重视和广泛地运用逻辑，提供一个全新的知识背景和可以借鉴的新逻辑观和新的逻辑方法。

有助于推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以注重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并具有精确性、明确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特征的西方思维方式之优长，则正是以重直觉、重归纳、重类比的，具有直观性、意会性、笼统性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缺陷。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实现中西思维方式的互补，从而实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理性与德性、形式与内容或本体、民族性与世界性、智与仁、名与象、思与诗的统一）。

二、基本内容

20世纪逻辑学命运是指逻辑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处境、遭遇和发展状况。这百年逻辑学的命运可分为：建国前（我们称为中国现代时期）逻辑学的命运和建国后

逻辑学的命运。建国前逻辑学的命运我们称之为逻辑学东渐的命运，它是指，作为“西学”一部分的逻辑学，在进入中国后，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的种种处境、遭遇和发展状况。依此对“逻辑学东渐命运”的界定，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逻辑学东渐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很好的发展。建国后逻辑学的命运包括：20世纪50~60年代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和20世纪80~90年代逻辑学的命运。建国前逻辑学命运研究是百年逻辑学命运的核心。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20世纪逻辑学的命运及其文化原因，当然，我们并不忽视逻辑学对中国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的研究。

我们对20世纪逻辑学命运的文化原因分析是从思维方式和文化学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来进行的。这是因为，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借助于思维工具认识思维对象的模式。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差异就是其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是体现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例如，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科学思维方式的理性特征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思维方式是生存方式的反映，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标志着社会的进步，而思维方式对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革起着重大影响，先进的思维方式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落后的思维方式则对生存方式的变革起阻碍作用。价值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价值观念就是人们在关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各种价值的观点或看法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这些事物所具有的这些

价值的信念。这些信念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确立价值取向和追求的范型和定势。^[7]思维方式决定着价值观念的产生，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就影响价值观念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会影响着思维方式的变革。本书拟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来分析逻辑学东渐命运的文化原因的。其中 20 世纪中国没有形成中西融通式思维方式是逻辑学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的重要文化原因。20 世纪中国学者不同的价值观念，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心态，进而影响了对逻辑学的选择。从文化论争现象中看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对逻辑学的态度和选择。出现的一些学者对逻辑学困惑、误读、批判等现象都是与这些学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有关。

研究逻辑学的命运和分析形成此种命运的文化原因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逻辑学东渐命运怎样？或者说近代以来，作为“西学”一部分的逻辑学，在进入中国后，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的种种处境、遭遇和发展状况怎样？为回答这一问题，本书首先考察了逻辑学东渐的社会文化背景。逻辑学的东渐是社会提出需要与提供可能的结果，中国现代社会变革，逐渐把对西学的关注，由器物，而制度，而观念；服务于社会变革需要的文化的嬗变把对西学的关注集中到方法上；一些先进学人对逻辑的引入、介绍和研究等这些因素促成了逻辑学的东渐。逻辑学东渐后，尽管一些学者认识到逻辑学的方法论意义，把逻辑学运用于学术研究中。

但是，从总体上看，逻辑学的东渐并非一帆风顺。应当认，一门科学的引进、传播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初期不可能处于一切完善的状况。然而，即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

内，我们还是应当指出，逻辑学在中国 20 世纪上半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逻辑学的发展也并非顺畅，逻辑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社会处境不佳，社会地位不高，逻辑学的传播内容相对陈旧，译文水平不够，教师队伍不足，教材混乱，学者总体研究水平不高。出现对逻辑学的困惑、误读，甚至批判等现象。逻辑学东渐的命运说明逻辑学并未能渗入或扎根于中国文化。

分析逻辑学东渐命运的文化原因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或角度来论证。

首先，从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看，中国现代时期一些学者就此问题发生了“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30 年代形式逻辑论战等数次论争。从文化论争的原因看，中国现代文化论争受社会需要的影响，许多学者从功利性角度看待西方文化。即，中国现代文化论争始终没有离开服务于社会需要这一目的。所以，在选择文化时，直接与救亡有关的文化往往易于接受，而远离社会政治需要的文化如逻辑学不会被人们十分重视。从文化论争双方看，不同学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了他们对逻辑学的态度。东方文化派（如国粹派、折衷调和派、玄学派、新儒家等）站在中国文化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引入西学、逻辑学作为研究国学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学问来引入。西方文化派站在西方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文化的关系，他们在宣扬科学的同时，也宣扬逻辑学，只是把逻辑学作为宣传西学、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的工具而已，忽视了逻辑学的自身建设。它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8]东方文化派视逻辑学为治国学的工具，西方文化派把逻辑学当成宣传科学的工

具，二者都没有把逻辑学当成学问，当成体现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科学来引入、研究，王国维早就说过，“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9]梁启超总结“新学家”的失败：“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10]其结果必然不利于逻辑学的传播，影响了人们对逻辑学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

其次，从一些学者对逻辑学的困惑与误读看，王国维因为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可信”而“不能爱”，最终放弃对逻辑学研究；张东荪的多元逻辑、胡适的试验逻辑学都是对逻辑学错误理解的表现。梁启超等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参照系研究《墨经》的做法不利于逻辑学的发展。出现的这些现象是他们文化价值观念的表现。

最后，从思维方式看，中西融通式思维方式没能产生是形成逻辑学东渐命运的重要文化原因。逻辑学体现出科学思维方式的抽象性、分析性、求真性等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直觉体悟型思维，直觉体悟思维不同于科学思维就在于其特征的差异。直觉体悟思维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经验性、朴素辩证性、求实用性等。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不出逻辑学。体现中国传统思维特征的名学是关于“名”的学问，辩学是关于谈说论辩的学问，它们不同于逻辑学。

既然逻辑学是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产物，而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又无法生长出逻辑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发展逻辑学就必须完全否定传统思维、实行全盘西化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是一个连续的确定的过程，人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的。另一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在此种思维主导下的西方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抛弃历史、全盘西化，又需要抽象思维——下，要发展逻辑学，就只能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将它们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既保留传统的人文精神又吸纳了西方的理性精神的“中西融通式思维”。如此才能为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现实的思维基础。而逻辑学之所以在现代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恰恰是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思维基础，尽管中国现代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它批判了传统思维的某些特征，引入了科学思维，并尝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但是，中国现代出现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思维方式都不是中西融通思维。“全盘西化”思维只仅仅抓住了文化发展的间断性，而没有看到对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全盘西化方式，走向虚无主义。中体西用思维仅仅抓住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走向保守主义。这两者各执一端，均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全盘西化”思维。

关于建国后逻辑学的命运。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哲学界、逻辑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这场讨论是建国初的一次重要的学术盛事。这场大讨论涉及了形式逻辑的对象、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真假与对错关系以及形式逻辑的作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等问题。这场讨论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既有积极意义，也产生消极影响。积极意义在于：肯定形式逻辑；提出并使学术界深入思考了诸多问题。但是，这次讨论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表现在受苏联影响，注入了所谓清除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分，而妨碍了对逻辑问题的清楚认识，以致影响至今。对数理逻辑的批判也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形

成这场讨论的文化原因与毛泽东的逻辑观和当时的学术政策有关。

20世纪80—90年代逻辑学队伍建设状况和学术界对逻辑学的消极思潮构成这一时期逻辑学的命运；这一命运与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文化建设有关。

研究逻辑学命运及分析形成这种命运的文化原因的最终目的是为当今逻辑学在我国的建设提供借鉴。针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忽视逻辑学的现象，本书提出逻辑学在中国重建的设想，即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也是逻辑学体现的理性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融合。也只有如方克立先生所言的形成一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或统一，也就是东西文化精神的结合、融合和整合”^[11]的新文化，逻辑学才能得以很好的发展。由此看来，我们试图“遵循”的毋宁是胡塞尔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他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进行的这种研究（它已经拟定了我们所准备的建议的样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历史的研究。我们的任务是去理解哲学的、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历史发展的目的，同时也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是这种目的的承担者，我们通过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参与实现这种目的。我们试图识别和理解贯穿于这一切既互相反对又互相合作的变化不定的历史的努力中的统一性。我们在不断进行批判的时候，总是把整个历史的复合体视为一种个人的复合体，并从中最终看出自己所需承担的历史任务。我们不是从外部、从事实（仿佛我们本身所经历的这一时间的变迁只是一种外在的因果系列）来识别这种目的，而是从内部来

识别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我们不仅仅是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本身完全是历史精神的产物）才能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任务。”^[12]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客观地写一部逻辑学的百年史，而是意欲在对逻辑学与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探析中，发现真正属于我们的任务——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接轨。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论文主要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以及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

（一）“文化学的方法”

论文中运用的“文化学的方法”是指运用文化学的基本理论，研究逻辑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关系，主要的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对逻辑学发展的影响，进而探讨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运用此种方法，我们应该明确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交流一般规律。

1. 要明确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界，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主要有两种观点：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有许多学者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有些学者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这种对文化的划分都是从广义上进行的。即他们把文化视为社会的反映，既包括生活方式的内容，也包括生产方式的内容等。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起草“1988—1997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基本文件时，把文化定义为：“社会的文化生活可以看作是通过它的生活和生存方式，通过感觉和自身感觉、

行为型式、价值系统和信仰而表现出来的”。^[13]狭义的文化一般是指精神文化，或观念层面的文化。泰勒就把文化从狭义上进行定义：“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4]美国学者恩伯夫妇也认为：“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15]如前所述，本选题所使用的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思维方式的观念。

2. 要遵循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

一般地，文化的发展是通过文化交流进行的。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不同文化相互间的碰撞、冲突，最终促成它们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必须是文化基本精神的有机统一。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交流时，应该遵循文化交流的这一规律。尽管第一次文化交流都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必须以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为准则，否则，就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我们研究逻辑学东渐命运的文化的原因时，是以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及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为准则的。我们发现，逻辑学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没有得到顺畅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遵循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首先，中国近现代文化交流是在不平等下进行的，西方文化输入我国是借助于其军事侵略来实现的。这种不平等性不可能使二种文化真正的融合。其次，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需要影响了文化的正常交流。文化的交流固然受社会、经济的影响，但是，一旦社会对文化提出特殊要求时，文化与文化之间就不能通过自身的碰撞、冲突而达到有机的统一。中国近现代时期，文化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重任，这就影

响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认识，导致文化选择带有实用性、功利性。再次，文化的交流通过文化基本精神来实现的。在选择文化时，应该选择文化的基本精神来与本民族文化相交融，日本学者福泽喻吉说过，“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因为：“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求，……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16]中国近代文化嬗变之艰难，也与中国近代学人在选择西方文化时没有从“难”到“易”有关。最后，研究文化交流时，应该明白文化融合的涵义。也有人把文化的融合称为文化的整合，“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物质不仅仅是习俗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17]这句话说明：文化的整合（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的有机统一，即，文化“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基本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基本精神。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文化模式都不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前者是“随机拼凑”，走向保守主义；后者是否定传统，走向虚无主义。钱穆说过，“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新，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个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种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在异中求同，在同中求异，又能集异见同，采集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建造出一理解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主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